

2012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劳动热情与弄虚作假
——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国家权力
的一致、分歧与互动

LABOR ENTHUSIASM AND DECEPTION

Jia Wenjuan | Zhongshan University

Labor Enthusiasm and Deception

Jia Wenjuan

Abstract

Based on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TY Factory” in 1953-73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elderly worker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radiction in Mao era industrial production; on the one hand, people threw themselves into production with enthusiasm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fraud was widespread. Existing studies of the work unit have difficulty explaining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aims of the state and the producers within the industrial work units, arguing that even if the state and the direct producers both recognized socialist ide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tion, the former put more emphasis on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hereas the latter put more emphasis on raising their own standard of living and other direct benefits. When the state forcibly promoted an agenda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point of harming the work unit community and people’s interests, the people would resist state interference through “pragmatic practices” intended to garner more resources from higher levels of the system.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situation in rural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author finds the ability of the producers at TY Factory to employ “pragmatic practices” was due to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eavy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TY Factory workers’ use of deception was not a form of proactive resistance but rather an adaptation –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benefits gained by employing these methods they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state system of production.

劳动热情与弄虚作假

——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国家权力的一致、分歧与互动

贾文娟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劳动与工作访问学者

[摘要]通过对TY厂1953-1973年档案资料的查阅以及对老工人的口述史访谈,本文发现毛泽东时代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人们热火朝天地参与到生产中去;另一方面,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现象却也层出不穷。原有的“单位研究”范式在解释该现象时存在困难。本文从国家的意愿与工业单位中生产者的意愿之间的一致与分歧入手,认为尽管国家同直接生产者都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生产的重要性,但是前者更为关注“现代化”与“国际竞争”层面,而后者更为关注自身生活水平提高与直接的感受。当国家强行推行现代化项目并因此损害了单位社区以及人们的利益时,人们会通过“实践技能”来对抗国家权力的干预,并尽量从上级部门获取更多资源。然而,通过与农村社区的对比,笔者发现TY厂生产者之所能够顺

利运用“实践技能”也是因为重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TY厂工人的弄虚作假并非积极的反抗，而只是积极地适应——正因为能够通过这些手段获取利益，他们反而被整合到了国家的生产体制之中。

一、问题的提出

从数字上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是惊人的：1952-1957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达到了18%的年增长率，国家工业产值几乎翻了一番。在1963-1965年大跃进之后的恢复时期，工业生产也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5.5%。在1957年，即便经历了文革非正常时期，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仍比1964年增长了1.9倍（莫里斯·迈纳斯，1989）。然而，振奋人心的数字既无法遮盖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被摒弃的事实，也无法遮盖工业生产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

一方面，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象中，人们有着主人翁般的喜悦与自豪感，他们对生产的参与是热情、积极、甚至是无私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生活水平并不满意，生产中也存在很多欺上瞒下、见风使舵和弄虚作假的情况。在广州市某重型工业企业TY厂计划经济时期档案资料记述以及老工人的口述史中，这种矛盾和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愈发明显和剧烈。

我们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存在多种想象，但如何把这些矛盾的画面统合在一起来理解呢？为什么一方面人们在生产中表现出得满怀热情、干劲冲天，但另一方面，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却也层出不穷？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拼凑出一个有关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过程的完整画面，还在于能够揭晓生产对于国家与生活在单位社区的人们不同意涵，以及庶民对于这种异议的处置方式。据此，我们能够得知国家权力触角在渗透工业领域、对作为生产组织的单位进行控制时所遭遇到的障碍，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以何种方式被整合进国家的目标之中的。

二、作为生产组织的单位：矛盾的存在与冲突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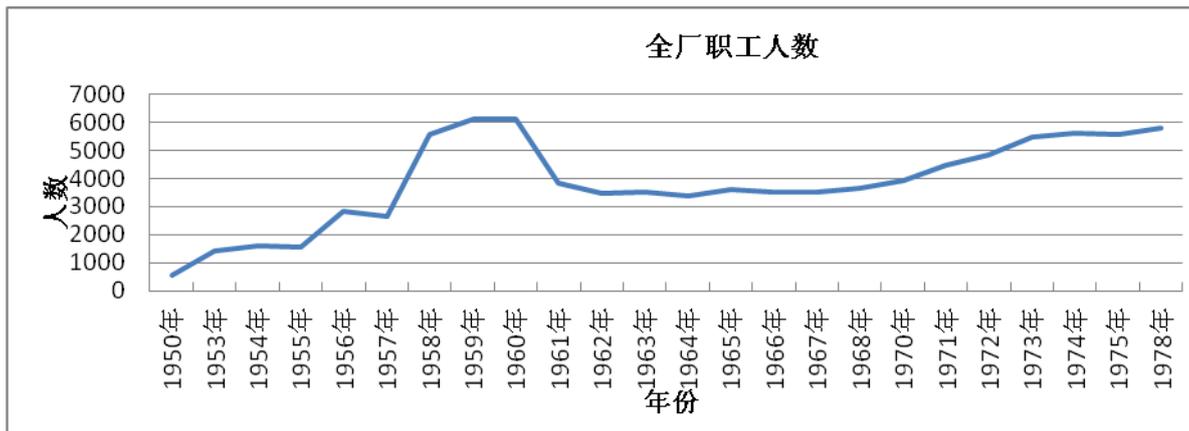
1、TY厂：热情劳动与弄虚作假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制造业。1953年，位于广州的三家钢铁机械厂合并组成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TY厂¹，并划归一机部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管理，成为全国六个通用机器厂之一，担负起华南地区工业建设的重任。TY厂在计划经济时期经历了多次组织结构的调整，其1956-1965年间，共有21个科室，9个车间²。TY厂建厂初期职工人数为1425人，1960年则达到了6122人之多（如图一）。

¹ TY厂的前身是1949年2月成立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广州制钢厂、1948年6月成立的原公私合营的广东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专为纺织厂修配机件所设的原广东机械厂，解放后三个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接管，命名为广东省钢铁机械一厂、二厂、三厂，属地方国营。

² 21个科室分别为财务科、计划科、生产科、劳资科、人事科、行政科、质量管理科、供销科、基建科、安全技术科、锻冶科、工艺科、设计科、设备动力科、工具科、保卫科、职工教育部门、职工子弟学校、经济警察队、消防队、职工卫生所。9个车间分别为：一机车间、二机车间、铆焊车间、木模车间、铸钢车间、铸铁车间、锻压车间、下料车间、装配车间。

图一 TY 厂职工人数变化



建国初期，TY 厂仅生产车床、刨床、洋灰搅拌机、油压千斤顶等用于初步工业化的较为简单的通用机械；1955 年，TY 厂开始研发和生产制糖机械，并成为国家定点生产制糖机械的企业³。1958 年 TY 厂下放给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随着大跃进的展开，TY 厂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从用于食品制造的制糖机械拓展为为制造钢铁设备、化肥设备、水泥设备、炼油设备、制糖设备、以及离心机、千斤顶和耐酸泵，并成为全国生产离心机的两个骨干厂之一，其产品曾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⁴。1962 年 TY 厂重新收归共和国一机部管理，紧跟国家工业化的步调，其主要产品亦转为化工石油设备、离心机、千斤顶和耐酸泵。除此之外，作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TY 厂不仅需要进行常规产品的研发制造，还需要承担极其重要的军工生产任务。因该厂在全国工业布局和生产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多名中央领导人曾亲自来厂视察生产，时任中南局局长陶铸更是 1961 年、1964 年两次在该厂进行过长时期蹲点⁵。

讲起自己在 TY 厂时的生产，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会很激动地向我们描述自己与其他人对生产劳动的热情投入。CGQ1950 年 8 月份进入 TY 厂（前身）做学徒，一干就是 45 年，60 年代被提为干部。回忆起计划经济时的生产，他现在仍然很兴奋：

“我们车间有一个工人，他有九个小孩，到底哪个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零件在什么地方，加工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他清楚得很！他把精神全放到了工作上。”

看着我们惊讶的表情，他接着说：

“那时候我们每天起码工作 12 小时以上，都是自发的，我今天有个东西上面等着要，我就想‘不行哦，死人的！赶快做！’一吃完饭丢下碗就去做了。TY 厂一个精神是，二两粮票闹革命，（加班的）待遇就是一个糯米鸡或者一个包子。”（访谈：LGQ）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LZL1952 年进入 TY 厂（前身）成为生产计划科的科员，后来做了 30 多年的生产科副科长，因其前妻是澳门人，不仅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先

³ 《广州市志第六卷（上）》，P685。

⁴ 《广州市志第六卷（下）》，P66。

⁵ 陶铸每次蹲点时长都超过一个月。

后多次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还被限制使用，直到改革开放后被提为科长。然而，提到那时候人们对生产的态度，LZL 不由连连点头：

“唉呀！很关心生产的！发自内心地关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心态完全不一样！生产组长在小黑板上写上“生产直落”，工人本来四点下班，生产组长写上生产直落，工人就很听话，没有人有意见的。一直干！两班顶三班和直落是两回事，干白班的就是直落，开三班的就是两半顶三班。那个时候不讲累的。现在人很难理解的。你们现在一个星期干五天，我们哪有五天的，不是六天，我们是干七天的。” (访谈：LZL-5)

SY Y 于 1958 年进厂，2000 年退休，在 TY 厂做了一辈子的工人。他对自己刚入厂的那段时间记忆犹新：

“那时候刚刚大跃进么，工人一天 8 小时之外，还要加班加点，义务劳动，连周六周日都要加班干。那时候的人都很老实的，加班就加班，上面一说今天这个什么什么任务还没有完成，晚上要加班干完，大家都没话说的（不会抱怨）。” (被访者：SY Y)

实际上，除了 TY 厂的工人，任何一个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工厂生产的人都无法否认当时的生产热情。然而，另一方面，弄虚作假的情况却也同样存在着，对于这一点，在生产科工作了四十多年、一手制定 TY 厂生产制度的 LZL 是很有发言权的：

“有很多种完工方式，叫做缺件完工，零件还不全就报完工，还有一个质量还没有搞好就报完工，实际工作量还没有做够，就报完工，你看，黑幕多得很！月月完成生产任务！还有，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的？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那些都是靠估算的，那些黑幕很多了！所以我们从来都完成计划的！（笑）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 50%，那就加到 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完成百分之几那个数就很有水分。” (被访者：

LZL-6)

对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了质疑：“工人知道这个吗？难道他们对此没有意见？” LZL 接着说：“嗨……谁都知道，厂里面谁都知道！而且工人也支持！”

TY 厂生产上一直存在的各种舞弊情况在 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期间在广州市委的指示下被集中揭发出来。在厂党委带头做检查下，全体干部在两星期内揭发出 193

条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也有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搞小包工的；有瞒上瞒下、无政府状态的，也有伸手要钱、漫天要价的。总之五花八门，无所不有。”⁶值得注意的是，被检举出来的各种问题——包括谎报指标、掩盖质量问题等等——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工人和干部共同参与、互相包庇的集体性行为。

通过对TY厂档案资料的查阅以及老工人的访谈，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呈现出的是一张断裂的画面，一方面是热情高涨的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中人们的营私舞弊。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呢？这种矛盾背后说明了怎样的问题呢？

2、从单位研究到国家的视角

单位研究作为一种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权力结构与社会整合出发的视角，认为“单位”是构成中国城镇社会的基本管理体制，是国家对城市社会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工具：通过它，劳动者得以被动员参与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公共政策在基层得到了更好地推行；人们对国家的政治忠诚能够被更好地监控（Xiaobo Lv, Elizabeth Perry, 1997；Bray 2005；Walder, 1986；Whyte & Parish, 1984；李路路、李汉林，2000a；路风，1989；刘建军，2000；等等）。然而，这种视角在处理上文所述的现象时却存在不足。

单位研究倾向将工厂官员和国家政权进行混合化处理，干部——尤其是党的干部——统统被当作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在动员范式中，基层干部是动员技术的实践者（林超超，2010），在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干部则成为了“信仰的载体”，人们对党的忠诚被置换为对领导的个人忠诚（华尔德，1986:137）。在面对政治整合、中央政策在基层的推行等问题时，这种分析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生产中，如果仅将干部看作上级权力机构在单位和车间的延伸，旨在对底层进行控制，那么便无从解释生产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情况——这在共产党政权严密的网状组织下根本不可能发生。

当将单位看作对城市控制的组织工具时，福利会被看作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根据对匈牙利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论推演，Burawoy认为工人在劳动力再生产上越依附企业，他们越难以摆脱专制性的控制（Burawoy, 1985），而在新传统主义范式中，这种控制则是通过利益交换而达到的——部分工人同领导建立起互惠关系，以对领导的踊跃支持和积极效忠来换取个人福祉（Walder, 1986）。但在中国，实际上劳动力再生产产品是与工人身份捆绑在一起的，其所在单位的情况对职工福利获得的影响要远高于领导个人，换一个角度来看，人们可能反而会因为拥有单位福利而更加难以被控制（蔡禾，1996；平萍，1999）。

这种分析视角下，庶民对单位事宜的参与存在两种状态：或者在党组织的心理与情感攻势下，出于愤怒、羞愧或畏惧的情绪而投入到组织指定的事业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权力被动接受者，职工的主体性与反思能力是不足的，他们无法做出违背上级权力意愿的事情；或者在福利的绑架下，成为斤斤计较、工于算计的理性人，出于对直接利益的斟酌而投入领导指定的活动中，人们的真实信念与自发热情又被忽视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矛盾的人：一方面，他们激情澎湃地讲述过去为工业生产是如何献身的，一方面，他们告诉我们自己是如何想法设法对付上级权力对车间的控制。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在于工业企业作为政治控制的单位被给予了充分的分析，而但其作为生产组织的单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单位中的“生产”既关乎国家的意愿与行为，又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福利状况，脱离生产本身而去谈“国家-工厂-职工”关系，结论难免偏颇。当把目光投向生产领域时，我们发现工厂中的干部、工人对社会主义所怀有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们的行为逻辑并非单一取向的，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或对立。

⁶ TY厂档案，1964年“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

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斯科特考察了国家的需要与庶民需要的不同：非工业世界的后独立时代领袖（有时他们就是革命领袖）痛恨殖民统治的过去和停滞的经济并试图创造一群值得骄傲的“人民”，国家追求的是现代化的目标，遵循的是发展逻辑——一种由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对自然和掌握改造构成的整体性图景。而庶民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地方性社区中，追求的是直接与其生活感受、社会交往相关的经验。国家主导的意愿良好的现代化项目实际上往往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詹姆斯 C 斯科特，200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缄默不能被直接推论到生产领域⁷。本文从这个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国家与普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单位、劳动生产等问题上存在的一致与分歧，理解人们在生产中的矛盾行为。本文认为在中国，由单位组织的“生产”既与国家追求现代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糅合在一起，当国家试图通过“单位”这种组织形式控制生产时，人们则试图利用“实践技能”来维护和争取自己与本社区的利益。通过直面这些行为，本文试图分析一种冲突与整合的辩证关系，即在与国家意愿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一方面通过“米提斯”⁸达到他们的意愿与诉求，另一方面又被纳入到国家目标之中的。

三、一致与分歧：国家的志向与庶民的需要

1、生产与现代化：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将新政权设定为与社会全然对立的“权力”是需要谨慎，新政权的领导人不少是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当这些人成为政策的制定者时，他们自然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助于工作安全和福利提高的制度（Perry, 1989）。建国伊始，党将全人民的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是存在的，1954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了这一点：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⁹

建国初期，人民需要的满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目标，而现代工业的发展曾被设想为是实现前者的手段：“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¹⁰

然而，笔者发现在195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目的与手段发生了微妙而谨慎的互换：“在

⁷ 如果说政治上的缄默与服从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或者至少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那么在生产上的缄默与服从就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⁸ “米提斯”概念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在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经常被赞誉为有丰富的“米提斯”并使用它智胜敌人，所以“米提斯”在神话中的含义是“狡猾”和“狡猾的智能”。而对于斯科特而言，“米提斯”包涵人们在对不断变动的环境作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

⁹ 195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¹⁰ 同上。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必须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生产继续迅速地发展。”¹¹这种互换在 1960 年已经变得很明确，在提及集体食堂同其他福利事业时，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办好这些福利事业，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就更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¹²这意味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是福利——才是事业核心。时至 196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对艰苦朴素的号召外，有关幸福生活的话语已从国家视野中淡出，在 197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¹³一句带过。

相对于对此，国家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强调是逐渐增加的：195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¹⁴表达了国家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强烈渴望；而 196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¹⁵已然是极端现代主义¹⁶的声明；1975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家的视角的显示。通过对它的分析，不难看出国家态度的变化：尽管社会主义目标是由人民幸福与生产发展两方面组成¹⁷，但后者才是主导与核心。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国家的视角做如下归纳：

其一，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主要需要在于对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追求，以便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获胜。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源于殖民地时期，并被不断延迟（罗丽莎，2006：8）。而在毛时代的冷战背景下，这种渴望变得更为迫切，正如 195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出的：

“全国解放之前，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和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加紧努力进行经济建设

¹¹ 195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¹² 196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27/content_212502.htm。

¹³ 197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23/content_208796.htm。

¹⁴ 195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¹⁵ 196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¹⁶ 极端现代主义是 James Scott 的一个概念，极端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的信念。其核心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对自然的掌握的强烈自信。见詹姆斯·斯科特，P117。

¹⁷ 195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1957 年则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享赋予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可见，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繁荣发展与人们生活幸福两个方面组成。

来保护和巩固这个新中国。”¹⁸

“现代化”理念源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杨美慧，2009：33），核心在于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对自然的掌握的信念和追求（斯科特，2004：472），殖民情境使中国意识到其必须与西方进入同一个游戏之中进行竞争——不同的只是采用的手段：

“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¹⁹

社会主义使中国得以将自己定位为激进革命的先锋，因而超前于而不是落后于腐朽的西方。远非抛弃现代性，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与西方进行的一场现代化的斗争（罗丽莎，P24）。不同与西方的是，无论是全方位改造社会的方案规模，还是国家机器使用的工具都很庞大，这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沿着极端现代化的道路走得更远（斯科特，2004：472）。

其二，国家对生产的需要在于达到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据此，生产被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即国家通过数字指标来对经济进行管理。

国家对生产的关注如同简略的地图，官方观察员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种数字、指标等全局性状况上，而不是真实的生产活动（斯科特，2004），它们的目的也不在此——当现代化成为国家的渴望，将生产情况指标化、全局化、简单化有助于测量国家同现代化理想的距离、有助于显示同西方的竞争状况。例如，在大跃进期间，国家以钢铁与煤的产量以证明已经做到了超英赶美：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在钢产量上，英国走了五十多年的路，我们只花了六年。...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到1907年，英国的煤产量才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而我国也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在195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鼓掌）”²⁰

“本应有多个发明和变化的源头，却被单一的计划权威所取代，本应有现存社会生活的弹性和自主，但各个位置已被指定、固定的社会秩序所取代”（斯科特，2004：123），这样做还有利于国家对生产的控制。

其三，国家对单位——作为生产组织——的需要在于，动员一切力量完成生产指标，实现国家的愿景。基于这个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单位中有关生产的一切也是位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的。国家运用行政机制直接进行任务的分配，企业无法决定生产什么产品，而生产资料则是根据任务情况由国家计划配给、商业和物资部门进行调拨，产品的销售去向也是被上级部门规定的。国家对国营企业采用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制度，国营企业需要的各项资金

¹⁸ 195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¹⁹ 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²⁰ 195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隶属关系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超定额流动资金则由国家银行贷款。企业资本的收入与支出由国家进行监督，除去企业本应上缴的税款外，其折旧基金和大部分利润必须上缴国家，归中央财政管理（汪海波，1998）²¹。

2、幸福生活与地位提高：—普通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

正如不可以不加辨别地认为国家对人们生活的无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TY厂的职工对国家的现代化志向的认同。1949年便入厂在铸钢车间做铸工的CX对我们讲：

“那时候看见电影电视里面，人家英国美国满大街都是小汽车，我们国家什么都没有，都希望国家发展、强大嘛。一名土改后到我们车间当支部书记的老干部在报告上说：‘美国佬凭着他们生产那么多钢铁称霸世界，我们中国如果不赶上它、不生产钢铁，就要被人欺。’”

（被访者：

CX-2）

尽管如此，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工人热情劳动的充分条件。不同于国家，庶民会试图将这些远景同自己的实际感受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正如CX接着说：干社会主义啊，希望给社会搞好了，以后就幸福了，作为一个目标。

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经济形态（恩格斯，1995【1880】：130）。这个定义既包含了生产的发展，又包含了人的需要，国家的视角更为关注前者，并确信要达到美好未来需要进行暂时的牺牲（詹姆斯C斯科特，2004：125-126；Baruch Knei-Paz, 1994），而庶民的视角则聚焦于后者，希望自身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之所以热情地投入生产是因为他们试图以辛勤劳动获得社会主义所许诺的更好生活和主人地位，而这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说辞是一致的。

首先，在生产中，工人能够获得尊重、尊严和价值，并感受到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又使得他们更乐于生产。劳动过程具有两个分析上有别，但在具体上不可分的方面——一个是实践方面，一个是关系方面。在实践方面，工人通过生产工具将生产资料转变为产品，在关系方面，在生产中工人彼此之间、以及与管理者进行着互动和社会交往（布洛维，制造同意）。一方面，大多数工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来源于这种互动——尤其是通过与干部互动，如SYY的回忆：

那时候的干部带头吃苦，带头干重活，行政干部也要轮流到车间里跟我们一起劳动——那是真劳动，不是做样子，不像现在某些官员作秀玩虚的。安排工作任务的时候，也不是只要发号施令就可以的。有的时候他说‘这个工作要20号以前完成’，很多工人都说那怎么行啊，

²¹ 尽管1958年-1962年期间，大量企业由中央放归地方，但是上级权力部门对企业生产的控制仍然是严格的。

有困难啊，都敢跟他说的，敢不买他的账。如果平时你对生产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好的想法，都可以说出来，通过生产会议、车间大会和职代会等等，如果大家都觉得你讲的对，那就按你说的改。那时候鼓励这样。（被访者：SY Y）

这种社会交往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生活领域，如同 LGQ 所讲：

车间干部每个星期起码有一天两天是跟工人一起，不仅在生产中，甚至住到单身宿舍，了解单身汉的情况，党委书记就住到我们宿舍过……毛主席来过，朱德来过，总理也来过好几次，对我们都比较关心，还有陶铸啊，叶剑英啊，每年过年给我们职工拜个年啊。说话领导也听，你说的对就按你的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真的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为国家干活，都有那个境界的。

另一方面，人们生产出的产品也能够带给他们自豪感，LGQ 接着说：

还有游行啊，那时候很多的嘛，五一国庆都要去拿出我们的产品……很光荣的，（早上）四点多就起来了，走路去越秀山——集队，拿着横幅，标语，我今年生产增加了多少，有什么新产品，省有省的，市有市的。（被访者：LGQ）

这也为干部的工作带来了方便，曾任技术员的 CZK 说：

那时候我们毕业来厂的，都要先到车间劳动的，实习一年，这样就和工人建立了联系和感情，那时候关系很融洽的。凡是在技术上有所作为的，都是在车间搞的比较好的。还有和工人的配合沟通，怎么互相尊重，工人要求不高的，你见到他叫声师傅他满足了，说明你看得起他，工人是最现实最朴实的，你看得起他，他就很好的配合你，要不然他根本就不睬你。

在生产科工作的 LZZ 在同我们的对话中不断强调：“我们的工人是最好的工人！你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没话说的。”

第二，通过生产，单位社区的福利建设能够获得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提升，所以人们愿意努力工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具有“公私嵌入性”的特征，即个人的生活领域是与单位的生产领域是嵌套在一起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嵌套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所有职工的福利与工厂的生产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宋少鹏，2011:7）。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对职工而言是与自身荣辱相关的“家”，单位生产发展上去了，自己的生活才会好。

TY 厂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奖金或利润分成，这些资源会直接用于单位福利的建设²²。虽然该厂利润留成情况经历了复杂的变化²³，但多数被访者坚持利润的

²² 1952 年政务院颁布《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规定电业、机器制造业企业在完成国家批准的计划后可以申请从利润中提取 3.5%，从超额利润中提取 15% 作为本企业奖励基金，企业奖励金一部分可

5%是用于单位福利建设，他们愿意为本单位获得更多的福利基金而努力工作。在铸钢车间工作的 CX 对此的记忆就很深刻：

国家有规定的嘛！利润的 5%用于必须用于福利，这是固定的，福利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看病啊，伙房啊，厨具啊，制服啊，5%嘛！到个人手里的少，但是对厂而言就多了，利润大，个个积极性都很高。5%福利费是国家定死的。这个谁都知道啦，谁都知道的，因为福利是每个机构都牵涉到的利益问题，住房啊、医疗啊、伙食啊，都是在那里的，一般工人都知道生产上去才有希望，今年一百万块钱有五万，如果两百万呢，就有十万了。...那个时候比较自觉的。大家都是希望厂、希望国家发展的快一点，生产效率高一点。生产上去了，福利也就跟着好了。

(访谈：

CX)

TY 厂确实将这些费用用于提高本厂职工生活水平上。1957 年为止，TY 厂的福利设施已经有宿舍 19988 平方公尺、饭堂 3 所、营养食堂 1 所、职工子弟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礼堂、浴室、托婴所、女工卫生室、医疗所、职工疗养所（别墅）、理发室、招待所、三班休息室、职工俱乐部、图书馆、灯光篮球场、足球场及运动场、排球场、游泳池等²⁴。

当职工感受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便愿意投入到生产中，并期许更好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即认为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也是因为如此。曾在办公室工作的 LYM 说：

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工人还是很光荣的嘛，地位上待遇上都很好的啊。很多人都不愿做干部嘛！那时候发工作服，开始时工人有，干部是没有的，办公室干部都要借工人的工作装去见女朋友（笑）——那时候穿 TY 厂的工作服出去是很威风的嘛！后来干部才有了。所以有这种地位的话，你要动员他们（就很容易），主人翁地位是很容易感受到的，就跟解放前一比，改善了很多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大家都接受的，大家都觉得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被访者：LYM)

在实际中，职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是与其切身生活的改善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

以被用作福利基金支出。1953 年增设福利补助金，福利补助金按工资总额 2.5%提取的，可与企业奖励基金调剂使用的。1958 年国务院发文将奖励基金改为企业利润留成，留成比例以主管部门为单位计算确定，见《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1958）》。1962 年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得以恢复，1969 年医药补助费、福利补助金及企业奖励基金三项合并为企业职工福利基金，见《广州市志（第九卷下）》，P372。²³ 因隶属于一机部，TY 厂利润留成较高，利润水平完成计划部分按 3.5%进行利润提成，超计划的部分按照 18%提取²³，1959-1961 年间为地方企业，则利润留成额为 9%，1962 年又重新归属中央管理。

²⁴ TY 厂档案“1953-1957 年我厂有关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历年发展情况介绍”。

“当家作主”的话语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被尊重、被肯定；另一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努力生产能够使单位福利状况得到提高，进而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肯定是无法脱离其具体生产和生活情境的。

3、一致中的分歧

LZL 在总结自己在生产计划科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经验并对计划经济生产进行回顾时，道出他发现的一种矛盾：

“这是很矛盾的，不是说没有主人翁精神，人们既是主人翁、又挣钱，两种情况都混在一起。那时候有这种感觉，虽然不是直接挣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国家好了、单位好了、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后期（1947年）有这样的情况，多干些活，多给些钱。但是到了大跃进，就不给钱了，奖金取消了，但是工人还是很积极——如果不积极，就批判你。”

（被访者：LZL-4）

罗丽莎在对“新传统主义”进行批评时指出，该范式存在将工人物质化，把他们描绘成懒惰的、无秩序的、只注重眼前物质利益的本质化倾向（罗丽莎，2006：109）。普通人对生产的热情看似基于直接的物质利益，但实际上，这是与社会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和希冀，人们才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与工业生产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翁”与“生活好”是不矛盾的。

但是，对于国家而言，其社会主义志向在于通过使用权力加速进行一种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以建设一个所有人都能享受福利的现代社会。然而在“浮士德”似的理想中，国家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以至于手段替代了目的。在领袖的良好用意下，脱离于现实的生产图解被规划出来，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当涉及到国家与人们的关系，单位研究视角容易走向简单地服从或对立。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同普通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人民当家作主等看法是一致的，然而，双方实际关注的方面却存在分歧：当国家将社会主义作为追求现代化的强国方法时，人们只是希望过上好生活，当国家希望通过生产积累社会财富时，人们希望通过生产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当国家放眼于未来时，人们更加关注当下。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得以解释生产中看似矛盾的状况。

四、极端现代化项目与地方性社区的应对

从国家的视角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被化约为一系列简单的图解，能够被科学地规划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家的干预范围可以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成为被改变的对象，意图在于使之契合想象中的标准并走向完善。然而，人们对各种严格的社会束缚形式的抵抗使得中央理性的单一项目从未实现过（斯科特，2004）。

1930年，苏联粉碎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剩余的幸存者除了服从之外别无它法，人们无法使农村的指令性经济成功，但可以设法将破坏降到最低，至少保障其最低的生活标准

（斯科特，2004：482）。类似地，Jacob Eyferth 通过对中国夹江造纸技艺的研究，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当国家按照规划将家庭作坊式的造纸技艺整合到现代化工厂中、而将其余人口一概安排进农业生产时，当地社区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不得不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传统生产并设法参与黑市交易以维持生计（Jacob Eyferth,2009）。在于国家力量进行互动中，与“抽象的知识”相对的“实践技能”——亦被斯科特称为“米提斯”的、蕴含于地方性经验中的各种知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类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 TY 厂的车间。为了达到提高工业产值、加快发展速度的目标，国家通过三种方式对工业生产进行控制：第一，官员个人的直接控制；第二，指标化的生产管理；第三，通过政治运动促生产。然而，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会经常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当国家通过上述方式确保 TY 厂的生产严格遵照国家意愿进行时，TY 厂职工的福利与生活遭到了破坏，而这有悖于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建设，TY 厂作为地方性社区的“米提斯”技能被人们运用以规避。

1、官员个人的强压与职工的应付生产

大多数情况下，极端现代主义者是有权力的国家官员或首脑，极端现代主义与他们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斯科特，2004:5）。在中国的情境下，政治体制中的向上负责逻辑（李若建，2009）使得拥有权力的官员为其壮志得以舒展而将工业企业作为工具，并向其施加很大的压力。

1959 年以后，TY 下放至 GZ 市机电局管理，很多生产任务是由权力所有者强行施加给 TY 厂的。1958 年 8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²⁵（李若建，2009）。毛泽东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便将这种压力转移给基层生产单位，TY 厂就直接处于这种高压下。

大跃进初期，广东省对大炼钢铁并不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省委书记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你放不出卫星”，于是 1958 年 11 月广东省便开始大放钢铁卫星（李若建，2009）²⁶，1959 年初某日，广东省长陈郁风风火火地来到 TY 厂，召集工程师们生产大炼钢铁用 3 吨自由锻锤。然而，该产品的锤砧重 50 吨，远超出 TY 厂的生产能力，时任生产科副科长 LZL 说：“不行呀，省长同志，这个锻锤的锤砧就要 50 吨，我们厂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炼炉，这个我们做不了啊。”陈郁很着急，又找到设备动力科工程师 X 工，X 工也摇头说，不行，我们确实做不了啊！陈郁很生气：“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典型的保守右倾的人！工人，人家干活的，都说行！就是你！让你写个字、做个计划、下个命令，你就不敢！你们这些人啊，不怕共产主义建不成！不怕修正主义！最怕就是群众发动起来！”

陈郁便走去车间，直接下命令给基层，在上级高管的强大压力下，工人们都说“行！”。讽刺的是，正规的铸件生产程序应该是把熔化、炼好的铁水注到模型里面，使得铸件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因为 TY 厂没有这么大的熔炉，加之要赶生产任务，工人们便把生铁锭一条一条的堆到沙模里面，再把铁水淋上去。因为铁锭不可能被融化，铸件里面完全是空的，铸件如同一个空壳²⁷，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铸件只能应付上级的。

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 LZL 对当时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他说：

“很多工人都不表态——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你看，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有什么办

²⁵ 转引自樊天顺 编，1994，《国史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第 62 页。

²⁶ 转引自郑笑枫、舒玲，1992，《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第 262 页。

²⁷ 该事例来源于 LZL 的个人日记，《回忆 XYG》。

法？工人为什么说行呢？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耍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对付你。他们就想出来了这种浇注方法应对（上面的）瞎指挥。”（被访者：LZL-）

虽然人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但是对具体的实施策略却不予苟同，大跃进时期进厂做技术员的 LYM 说：

“省市领导，一个人抓一项工作，各个都说自己抓的工作重要——你也重要、他也重要，都是第一。作为我们工厂呢，工人就只有这么多，个个都要第一，那不是很难了吗？所以计划也乱七八糟，也不讲质量，都超过了你的能力嘛！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外号叫做大声公，他就是够胆讲话！他当时就对大跃进有点不满，召集中层干部来开会说‘你们来讨论讨论，三面红旗是两面红、还是一面粉红啊？’”（被访者：LYM）

1959 年，TY 厂转炉炼钢车间堆满了一筐筐包点，然而连续数月夜以继日劳动的工人迫切需要的是简单的休息，他们根本没有食欲，最终变质的包点从白蚬壳倒入了珠江。在上级强压下，TY 厂的生产和生活被彻底打乱，职工生活单一、休息不足、主人翁地位无从谈起。干部为如何应付上级官员而惶惶不安，想方设法“推、拖、拉”；工人则不假思索地一律说“行！”并进行应付式生产。最终 1964 年陶铸在 TY 厂蹲点时清算出，TY 厂造成了价值超过 18 万两黄金的浪费。

3、指标管理的压力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李若建，2009：85）。国家向企业直接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涵盖了企业生产管理的方方面面²⁸，且伴随着对总体生产发展的要求，单位需要完成的指标是逐年上升的。指标化减少了官员所必须考虑的变量，同时也提高了行政的规范性，但往往与企业实际生产能力不相符合。加之“短缺经济”（科尔奈，1986）的特征在中国国营企业中也普遍存在²⁹，企业的实际生产经常存在各种困难。然而，如果没有达到国家的生产指标，单位便无法获得奖金，企业地位会下滑，整年的努力劳动会付诸东流，人们“生产涨一寸，福利涨一分”的愿望也不会实现，这时，单位上下愿意通过弄虚作假而加以应对。

1961 年随着国家经济方针的改变，国家大量撤资、生产大规模压缩，许多国营大厂也陷入极端的财政困难中。61 年 7 月底，TY 厂银行贷款 2604 万元，月息 15 万元，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成本大幅上升、不合格产品大量积压，9 月份出现最大一次停产，10 月份生产下降

²⁸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包括总产值、主要产品产值、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1957 后减少为 4 个：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其他 8 各指标作为非指令性指标，各部门可以根据企业需要增加个别指标，1960 年又恢复为一五时期的水平。

²⁹ 供应上的不规律导致生产排序与劳动过程不断重置；中央计划机构指令的变化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车间生产经常遇到难以预计的瓶颈问题。

到几年来最低水平，11月份企业出现亏本³⁰。1962年，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仅是厂生产能力的28%，但生产指标却没有降下来，仍然是大跃进时期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TY厂揽活打杂，组织自接农业机械、轻化工业产品的订货任务，该厂自接任务占商品产值的66%³¹。而TY厂完成指标的过程中却充斥了种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投机取巧的做法：

一方面，TY厂通过统计造假应付上级权力部门下达的指标，LZL给笔者讲了当时的造假情况：

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那个变动——哎呀——太大了！乱七八糟了！那些计划都是假的！离谱的太多了！完全变了！...虽然任务是一直都有，但生产是按阶段的，我们厂里面有很多个生产阶段，衔接不上。等材料的时间很长，就算材料到了，上一个工序没有做出来，下一个工序也没得干。到了月末怎么办？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实际上没有完成，但是报了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了。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过了年还不是一样推？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已经报做完成！厂里面谁都知道这个，但是一机部根本查不出来——有很多方法蒙他们的！而且工人也支持这个，为什么呢？要是没有完成计划，整个厂就拿不到奖金，厂拿不到奖金你就没有好处，所以工人也参与其中，宁愿弄虚作假，没做完报做完。

（被访者：LZL-）

另一方面，对下游订货厂家隐瞒因赶工而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为了赶商品、抢吨位指标，铆焊车间的工人焊接锅体洗涤塔时不够细致，导致该产品第一圈试水的时候存在轻微的渗漏情况，但是为了避免拖延交货期、以及将该产品计入生产指标内，质检科科长看见后并没有提出检查该产品出问题的原因，而是叫车间赶快把把缝隙焊好，不要让订货方知道了。又如1961年，黑龙江轻工业厅向TY厂订制3台 $\phi 1250$ 离心机，部分仪表还没有生产出来并附上，就已经发货并收了货款，直至1964年，该厂仓库里还积存了一批漏欠客方产品附件加之达3万元之多。³²

这种弄虚作假不仅是某个部门或领导，而是从厂级领导、车间领导到工人一致认可的。从厂级领导行为上看，1963年在技措项下生产一台离心机自动绕线机，眼看年底不能完工入库，总工艺师便对检验科长说，这项技措如果完不成就影响拿钱了。于是检验科长便把这个不合格产品放了过去，草草安装好该机器，没有经过试运行就收到成品库算到1963年的生产指标中，直到1964年初又重新从仓库中取出并花了3个月进行返工。从车间领导的行为上看，1964年7月，铆焊车间有台再生塔有锤印不能入库，车间主任便找检查科长、检验员等说好话，要求先入库后再返修锤印³³。从工人行为上看，大揽杂活时，制造农用锄头

³⁰ TY厂1951年档案《1961年基本情况》，《1961年生产工作总结》。

³¹ TY厂1962年档案，《1962年大事记》。

³² TY厂1964年档案，《TY厂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

³³ 因为这样就能够算入生产指标了。

的时间定额是 3 小时打一个，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想出用滚筒机来滚压锄头的方法，只要 30 分钟就可以做成一个锄头，虽然产品产出大大提高，但是滚筒机却被搞坏了³⁴。结果，在 61-65 年间，TY 厂浪费损失达一千七百万多，积压物资七百多，工一千八百多，约占其固定资产的 60%。³⁵

国家的视角在于要求单位发动一切力量以达到由指标定义的结果，然而，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斯科特，2004：472），底层民众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使用了各种诡计予以应对，最终埋单者成了国家。

4、政治运动的压力与挂羊头、卖狗肉（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

与指标管理并存的是动员式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简单化的极端，这种以政治促生产的策略注重于人们的情感，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过程。建国后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旨在将人们的热情动员起来并转移到生产中去（裴宜理，2001）。然而这些旨在发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政治运动，实则却扰乱和打断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在这种情况下，TY 厂干部便使用“挂羊头、卖狗肉”的策略对政治运动进行有利于本厂生产的解读。

1957 年开始的反右斗争运动曾将 55 万多人划为右派分子（李若建，2010：158）。右派指标对 TY 厂生产的影响在于，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被划为了右派，这影响了工厂的正常生产。LZL 就因其妻子原籍为澳门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如此，但他的月工资水平并没有下降，而是仍然保持 140 元的月工资——比八级工月工资还高 22 元。虽然但凡政治运动，LZL 都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但并没有影响他参与决策 TY 厂的生产计划：

我是副科长，但正科长却什么都不懂，生产这一块实际上全靠我了，活儿都是我干的。

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有很多政治事务，我不用去，他顶上，我就能专心研究工作。我的工作很重要，包括下达月生产任务，年终进行生产工作总结。我做报告时，不用党委的名义，而是党委扩大会议——50 多个中层干部只有两个不是党员，其中一个就是我。

（LZL 访谈-）

文革一直都被看作是政治运动的极端，而《文革十六条》中对文革与生产的关系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的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可见，国家的意愿在于通过政治运动来促进行现代化进程，但在实践中，政治运动关注的是“阶级斗争”，这使人们难以从工作中获得尊重和尊严，而生产的停顿使单位福利难以得到继续提高。文革期间任机械车间工会主席的 LGQ 说：“我觉得最正常的是‘反右’之前，那个时候的总路线啊什么的，都是对的。之后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搞乱了，特别是文革。”当时在办公室工作的 LYM 也说：“那时候大家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都想好好搞生产的，不喜欢搞运动。”

为了降低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TY 厂在能力之及的范围内采取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策略。一方面，除了少数企图通过政治运动获得提升的人，大多数职工对于在各种运动中

³⁴ TY 厂 1964 年档案，《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

³⁵ TY 厂 1966 年档案，《关于反浪费斗争工作小结》。

对常年被批判的人怀有同情的态度。LGQ 说出人们当时的做法：

“有些人是很清白的，很好人的，我看他也很想进步，对社会主义也很赞成，但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运动的时候会被批，但一般这种人也就不批一批就算了。有的时候运动要来了，领导就会跟他说，明天要开 XX 会，你就别去了。工人也会帮着他的，文革的时候，看学生到了厂门口，就让他躲一下，出身是由不得自己的嘛！”（被访者：LGQ）

另一方面，在生产上，在政治运动仍然席卷全国各地工业企业的时候，TY 厂在“政治挂帅”的掩饰下，开始偷偷恢复原来的生产组织安排。TY 厂于 1967 年 1 月 23 号开始“夺权”的，2 月生产开始瘫痪，3 月 6 日，广东省和广州市军管会立刻派军代表成立生产临时指挥部，1968 年 3 月 27 日，TY 厂成立革委会并设立四大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和保卫组³⁶，车间设立班、排、连³⁷。时任办公室职员的 LYM 说：“搞四大组不能适应生产要求，所以就在生产组里面重新恢复了科室，实际上到了 1970 年，原来的生产制度就全恢复了。…那时候全国好多地方还处在文化大革命，还很乱，但是 TY 厂已经能发动职工了。你做得好呢，上面就看到了，任务就都给你了嘛！这样 TY 厂就更好了，把工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正因如此，在 70 年代初期，TY 厂很快又进入了一个上升期，成为当时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

据此，我们对文章最初提出的矛盾现象得以进行解释。本文并不否认人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赞同，而正是出于对该意识形态和国家对美好未来许诺的认同，人们才愿意投身于生产中。然而，不同于国家对现代化指标与国际竞争的偏重，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真实生活和直接感受。当国家主导的、一波接一波的极端现代化项目因为不符合地方性状况，而对人们的利益和需求带来负面效应时，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米提斯”策略加以应对，这样，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的手段自然便出现了。

五、分歧与整合的辩证关系——同农村社区的对比

本文并非将 TY 厂的职工看作与威权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英雄般的劳动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在国家严密监控下，只能通过“弱者的武器”表达着不满、依附于领导而获取资源的人（斯科特，2011；华尔德，1986），本人认为 TY 厂的职工是在工作场所中拥有“米提斯”技能，并能够借此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持赞同而非盲从的态度，当国家的视角与其自身的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他们试图运用各种实践技能保障或最大限度维护其社区和自身的利益。然而，也正因如此，TY 厂的职工亦被整合到整个生产体系之中，通过与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状况的对比，我们得以发现这种由异议到整合的过程是如何可能的。

Huangyin Li 在通过位于上海北部的秦村探讨国家政策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底层民众的抗拒如何影响国家领导者的决定。在农民-国家关系层面上，Li 认为底层农民能够通过“无权力者的权力”影响了国家的决定——大跃进在农民的反对下得以停止（Huaiyin Li, 2009）。然而，彭玉生则认为，国家之所以放弃人民公社仅仅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了，大饥荒并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权力”，是灾难性的后果而非农民的抗争使国家政策进行改变的（Yusheng Peng, 2010）。李若建的研究实际上支持了彭玉生的看法，正是因为国

³⁶ TY 厂 1968 年档案，《1968 年立卷说明》。

³⁷ TY 厂 1967 年档案，《广重厂生产临时指挥部成立以来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总结》。

家对于底层民众的各种实践知识的察觉而通过基层干部发动征粮与反瞒产运动，而在这场运动期间，基层干部甚至使用很恶劣的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并直接酿成了大灾荒的悲剧（李若建，2010）。可以说，同样是对“米提斯”技能的运用，农民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是以悲剧收场的——“反瞒产”运动说明了国家对底层民众可能进行的反抗行动的察觉。然而在TY厂中，通过对各种实践技能的应用，职工们不仅从上级部门获取了更多的资源，还保证了本企业在工业系统中的地位。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农产品直接服务于城市生产，城市工业企业因短缺经济的特征而处于极高地位。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于从农村地区获取粮食等资源以低价供应城市、服务于工业建设，这样，瞒报农产品必然会带来上级权力的警觉与控制；虚报农产品则会因随后的征粮问题对地方社区和农民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而工业产品要么以高价卖给农村，要么被分配给其他订货单位，而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生产企业的权力通常大过购买企业，所以工业企业谎报产出的收益往往由本单位社区和职工享有，而不良后果是直接由下游企业、间接由国家承担的。另外，不同于农村基层官员能够对农产品生产进行深入了解、简单估算与直接控制，工业产品复杂的制造流程，各种各样的机器操作，以及瞬息万变的车间环境，使得车间中的“米提斯”技能更为复杂和多种多样，这使得正式官僚系统对生产进行控制的门槛异常高。这使得TY厂这种企业更容易从上级部门获得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福利增长的资源。

其次，工厂干部与农村基层干部的提拔任免和调配制度使得他们对于下级的态度倾向截然不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基层官员的仕途通常是由官僚系统中的上级官员所左右的，同需要与同级官员进行竞争，而底层民众的生计水平和意见相对而言并不重要，所以在向上负责与理性驱动下，这些官员倾向于忽略民众的意见而遵循上级的要求（李若建，2010）。工业系统相对于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使得工厂干部的任免和调配所遵循的并不完全是科层制逻辑，更重要的是根据工厂的发展与工业产出由地方政府系统与其隶属的工业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的，所以厂级干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上级官员的个人好恶，而是工厂职工对其工作的配合程度。加之工厂干部是与工人生活在同样的工厂社区，在同一个工资系统中获取收入，所以他们个人的利益同单位利益以及其他职工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故而厂级官员通常有“以厂为家”的认知，有能力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想方设法应对国家的指令。

当陷入到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竞赛中时，国家领导者关注的也不是产品的质量或细节，而是全局性的、指标性的情况以及高精尖产品的研发，只要满足国家特定需要和重点产品的研发与制造，在其他方面的弄虚作假对于工厂而言收益相对高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同TY厂职工实际上是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看，TY厂职工的行动能够被理解为积极的适应，但却并不是积极的改变或抗争。TY厂职工的弄虚作假等行为源于底层民众的需求与国家需求的不一致，二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侧重存在的分歧。但是，因为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同底层农民相比，TY厂的职工仍然能够使用这些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损失、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而这使得TY厂的职工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相对高的社会地位，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70年代任办公室主任的LYM告诉我们，当时TY厂招工的火热程度堪比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很多干部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女送进TY厂当工人，那时候成为TY厂的职工是一件异常光荣、羡慕旁人的事情。70年代初期进厂的HGP对自己在529毛主席视察TY厂纪念日能够吃到鸡鸭、猪肉、鱼肉等加餐至今记忆深刻，并也因此对计划经济时期充满了怀旧情怀。在这种情况下，TY厂的职工会愈加倾向于认可该生产体系但借用“米提斯”技能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以此达成民众的利益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而正因如此，TY厂职工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对计划经济的生产体系构成任何挑战或表达任何不满，反而借助计划经济本身的缺陷而通过钻空子、捡便宜保障了自身的利益。这样，TY厂的职工看似同国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它们的行动却并不是反对计划经

济生产体系，反而被整合进了这个生产体系中。

六、结论与讨论:

在笔者对位于广州市的TY厂进行调查期间，发现在计划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有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喜悦感，在生产中充满热情；另一方面，生产中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现象却也存在，并且从厂级领导到车间工人都同意、甚至参与其中。本文通过对这个现象进行的讨论，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家与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的意愿既存在一致又存在分歧。社会主义理想包涵了现代化与生活幸福、人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国家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可和希冀是一致的。然而，两者的分歧在于当国家将社会主义作为追求现代化的强国方法时，人们只是希望过上好生活，当国家试图通过生产积累社会财富时，人们希望通过生产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当国家放眼于未来时，人们更加关注当下。而笔者观察到的矛盾现象正是基于这种一致与分歧的存在。

第二，不同于“单位研究”的观点，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既非工于心计、理性算计的功利人，也不是在国家动员技术下的权力被动接受者，而是了解自身利益，是在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拥有“米提斯”技能，并能够借此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的人。当国家通过官员个人的强压、指标式管理与政治运动三种方式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并因此损害TY厂职工利益时，人们通过应付生产、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挂羊头、卖狗肉等方式进行应对，并在这种互动中从上级部门获取了更多的资源。

第三，通过与国家的互动，以及资源的获得，TY厂的职工非但没有走向同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被整合到了整体生产体制中。尽管TY厂职工的弄虚作假等行为源于底层民众的需求与国家需求的不一致，但是，因为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同底层农民相比，他们仍然能够使用实际技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损失、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这使其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相对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TY厂职工的行动能够被理解为积极的适应，但却并不是积极的改变或抗争。

单位研究作为一种从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整合视角出发的理论——认为“单位”是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工具，并且较为关注再分配领域与动员技术——对很多社会现象作出了精辟的解释。然而，这种分析或者忽视了人们自发的热情，或者过于强调人们的理性算计，从这种视角出发，对解释本文所述矛盾现象存在欠缺。基于这个原因，本文认为对国家的意愿与民众的意愿的一致与分歧、以及二者在生产领域的互动的关注，可以为我们对很多的先前理论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

- 蔡禾, 1996, 《论国有企业的权威问题——兼对安基 G 沃达的讨论》, 《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李路路、李汉林, 1999 《, 资源与交换: 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李猛、周飞舟、李康, 2000, 《单位: 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秋季卷。
- 李若建, 2009, 《折射: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 李若建, 2009, 《指标管理的失败: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 《开放时代》第 3 期。

李若建, 2010, 《进步的陷阱: 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李若建, 2010, 《理性与良知: 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开放时代》第9期。

刘建军, 2000, 《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 天津人民出版社。

路风, 1989, 《单位: 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罗丽莎 著, 黄新 译, 《另类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出版。

亚诺什 科尔奈, 1986, 《短缺经济学(上、下)》, 经济科学出版社。

莫里斯 迈纳斯, 1989,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裴宜理, 2001,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中国学术》第4期。

平萍, 1999, 《制度转型中的国有企业: 产权形式的变化与车间政治的转变——关于国有企业研究的社会学评述》, 《社会学研究》第3期。

宋少鹏, 2011, 《“回家”还是“被回家”? ——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詹姆斯 C 斯科特, 2004,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詹姆斯 C 斯科特, 2011, 《弱者的武器: 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译林出版社。

林超超, 2010, 《新国家与旧工人: 196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社会学研究》第2期。

恩格斯, 199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汪海波,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

华尔德, 1986,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牛津大学出版社。

杨美惠, 2009,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江苏人民出版社。

Baruch Knei-Paz, "Can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Falsify ideas? Or, Karl Marx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aper presented to Political Theory Workshop,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November 1994.

David Bray, 2005,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iyin Li, 2009,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 Eyferth, 2009,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Burawoy,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Routledge Publish.

Whyte Martin King, Parish William L,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iaobo Lv, Elizabeth J Perry,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E. Sharpe, Inc.

Yusheng Peng, 2010, Book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